

王 殊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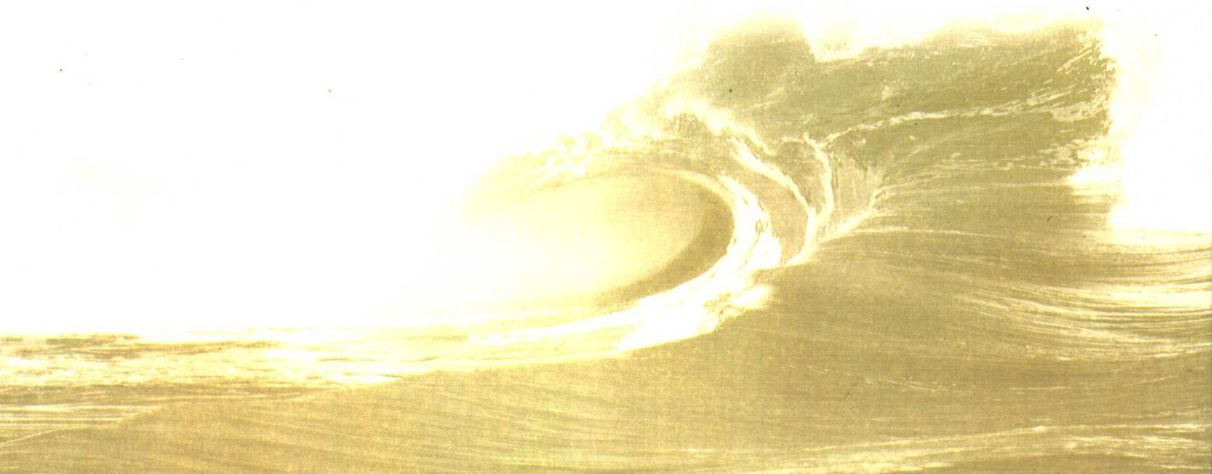
五洲风云纪

**见证历史：
共和国大使讲述**

抗美援朝战争硝烟中板门店停战谈判的细节，黑非洲莽原上外交拓荒者的足迹，加勒比海危机的暴风雨，美苏在欧洲的矛盾，中德（联邦德国）建交前后的内幕，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重视的对局势的估计……作者以平实的笔调，讲述了他伴随新中国外交事业发展，从记者到大使、走遍五大洲的传奇经历。

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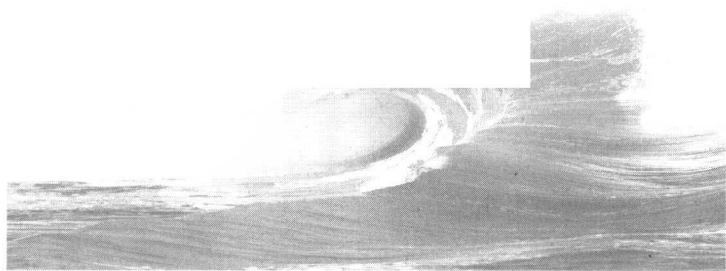
Jianzheng Lishi
Gongheguo Dashi Jiangshu



Jianzheng Lishi Gongheguo Dashi Jiangshu

五洲风云纪

王殊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洲风云纪/王殊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1
(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蒋本良, 刘文祥主编)
ISBN 978-7-5326-2213-9

I. 五... II. 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②外交史—中国—现代—史料 IV. ①I25②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0060 号

出版人 张晓敏
责任编辑 孙 毕
装帧设计 鲁继德 桑吉芳
美术编辑 路 静
技术编辑 徐雅清

本书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五洲风云纪

王 殊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9.75 字数 268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ISBN 978-7-5326-2213-9/K·4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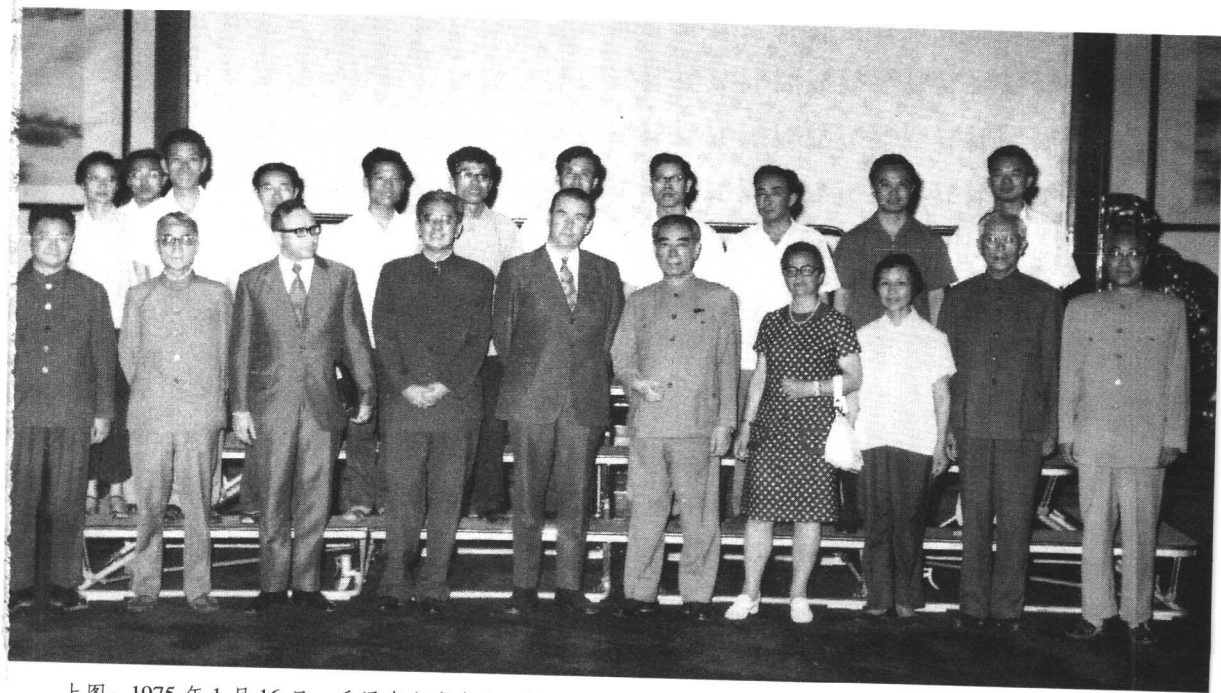
定价:29.00 元



作者简介

王殊，江苏常熟人，1924年10月生。复旦大学外文系肄业。1946年4月到苏北解放区。1948年10月起，任新华社驻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后为驻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记者，参加了淮海、渡江、上海战役的报导。1951年10月到朝鲜，任新华社驻志愿军总分社记者，参加了朝鲜停战谈判的报导。1956年5月起，历任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加纳、几内亚、马里、刚果（利）、古巴等国记者。1969年10月任新华社驻联邦德国记者。

1972年10月调外交部工作，任驻联邦德国使馆参赞，1974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77年1月任《红旗》杂志总编辑。197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0年任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大使、驻原子能机构代表。1986年11月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中国太平洋合作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现任中德友好协会会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8年离休。著有《国际通信选》、《15年驻外记者生涯》、《从记者到外交官》、《我在音乐之乡奥地利》、《中德建交亲历记》等。



上图：1975年1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接见联邦德国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

下图：1972年7月19日，周总理接见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



上图：周总理在1956年11月访问巴基斯坦时举行招待会

下图：朱德委员长1975年10月29日在北京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



上 图：
1974 年 9 月
6 日，邓小
平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联
邦德国基民
盟主席科尔。

右 图：
1975 年 10 月
29 日，邓小
平副总理以
周总理名义
为来访的施
密特总理举
行欢迎宴会。





上图：1986年6月13日，胡耀邦总书记在波恩工商会大楼作《中国谋求同欧洲发展长期经济合作》的讲演。

下图：1972年10月11日姬鹏飞外长和谢尔外长分别代表中国和联邦德国在北京正式签署建交联合公报。李先念副总理出席仪式。



作者王殊与夫人袁杰在寓所

序：在五大洲过春节

流光飞逝，我不知不觉已进入耄耋之年了。我在解放战争中当了新华社记者，五十年代初到朝鲜采访停战谈判，回到北京后被派到国外成了驻外记者，先后在巴基斯坦、加纳、几内亚、马里、扎伊尔、古巴、西德担任了常驻记者。在七十年代初，我又被调到外交部工作成了驻外大使，先后在西德、奥地利等国家工作过。过了花甲之年，我退出外交工作的第一线，又到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当了学者。我很感谢新华社和外交部，使我有机会走遍了五大洲，到过了八十多个国家，也报导了不少重大的国际事件，参加了不少重要的国际会议。我前后在国外工作了近三十年，如果加上前后在北京工作时临时出差时间就更多了。我在这期间大多数的春节是在国外度过的，有时只有一个人或几个人，有时是几十个人。现在，这些同志几乎都已退出了舞台，有些已先走了。每到春节，尤其是到了老年，我常常想起当年在国外过春节的情景，想起曾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引起了很多的亲切的回忆和怀念。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是不可能走遍五大洲的。

朝鲜战场上除夕之夜的特种礼花

我从1951年到1953年在抗美援朝烽火连天的战场上度过了三个春节，其中最难忘的是1953年的春节。参加停战谈判的志愿军代表团在开城邀请朝鲜人民军代表团一起吃了年夜饭以后，朝鲜《劳动新闻》和朝鲜中央通讯社的两位记者意犹未尽，又邀请我们一些记者到他们住地去迎接新春。那时，谈判由于美方的无理阻挠已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中方报刊的记者编辑都已陆续回国，新华社也只剩我一个文字记者和两个摄影记者，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两个摄影师，还有英国《工人日报》的记者阿兰·魏宁顿和法国《人道报》的记者贝却敌，一共七个人。我们在晚上九时多到他们的住地时，他们房子的地炕已烧得暖乎乎的，在电灯昏暗的光线下，炕中央一张长方形的矮桌子上已摆满了大盆小碗的食物和几瓶朝鲜高粱酒，在当时战争的情况下，主人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招待我们了。我们就盘坐在炕上的桌子周围，开怀畅饮起来。我们从谈判开始以来分别已有了一年的战斗友谊，但大家工作都很忙，供应也有限制，相聚在一起吃饭喝酒的机会也很少。我和另外一个南方的同志还闹了一个笑话，在昏黄的光线下看到一盆西红柿酱和一盆酱牛肉，结果筷子夹到碗里后才发现是生牛肉和狗肉。这是我们第一次吃生牛肉和狗肉，不免有些踌躇，看到三个东北、贵州的同志和主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洋人也弄不清是什么，我们也只好尽力吞了下去。

我们正在互相不断为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明年多打胜仗干杯时，开城两侧的志愿军炮兵阵地上发出了怒吼，一颗颗炮弹打得敌人的阵地上火光冲天。我们的小屋子也不住震颤，电灯也摇晃起来，窗户纸哗哗作响，有的一下子震破了。我们高兴得举起杯子来，高喊打得好。连续几个晚上，志愿军炮兵对敌人狠狠地进行了惩罚。这几个月来，美方代表在讨论第四项遣返战俘问题的议程

时态度极端蛮横，公开在会议上叫嚣“要用大炮来辩论”，我方代表严正指出，“只要你们有本事，你们就来吧！你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在战场上也得不到。”美国侵略军在中线发动进攻的同时，也对板门店谈判区和开城中立区加大了压力，一再违反协议进行轰炸和炮击。志愿军在中线接连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特别是上甘岭一仗打出了威风。在开城两侧的志愿军炮兵也不断同敌人进行了“辩论”，把敌人“批驳”得哑口无言。我们席散时已到了新春，志愿军的大炮还在怒吼，大家互相竖起了大拇指说，这是志愿军的春节特种礼花。

黑非洲盛夏火锅度春节

1960年的春节我是在撒哈拉以南黑非洲的几内亚度过的。几内亚是黑非洲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几内亚的教育部长巴里·迪亚万杜应邀在北京参加我国1959年国庆后，在10月4日同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在12月底，我国驻几内亚使馆临时代办赵源同志一行八人来到了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筹建使馆。几内亚在1958年9月取得独立，成为黑非洲第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当时，在这个地区只有两个实行自治的半独立国家加纳和利比里亚，其他还是在殖民统治下的“一片黑暗的大陆”。我是作为新华社记者于1959年初到达加纳和几内亚的，还比较顺利地建立了新华分社。几内亚独立后，一些殖民国家力图阻挠几内亚同我国建交，有的西方报纸公开说不能让中国在撒哈拉以南取得“立足点”。我在1959年5月从加纳到了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因为我国政府特使、驻摩洛哥大使白认同志要到那里移交我国政府赠送给几内亚的一批大米。白认大使根据国内指示，伺机同几内亚商谈两国建交的问题，因此在几内亚杜尔总统接见时，白大使提出了这个问题，总统表示完全同意。可是正要进一步商谈签署建交联合公报时，几内亚外交国务秘书在房

门口探进头来，示意请总统出去一下。杜尔出去了一会后对两国建交忽然变了卦，说这件事待后再商量，白大使只好告辞了出来。后来才知道，美国驻几内亚大使也在那时拜会外交国务秘书，商谈杜尔即将访美的事，并对几内亚同我国发展关系的事施加了压力。不久之后，杜尔访问了美国，可是美国口惠而实不至，他两手空空回来。他得到了教训，立即派出了教育部长到北京，授权他参加我国国庆后签署两国建交公报。两国对发展关系十分重视，我国外交部也很快派出赵源临时代办在年底之前赶到了科纳克里。

同志们都住在旅馆里，一面拜会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一面寻找合适的房屋筹建使馆。一个多月后，春节来到了。北京的春节是寒冬，而在几内亚却是盛夏，只有我一个人已在加纳过了一个炎热的春节，其他的同志都还是第一次，觉得很新鲜。赵源同志说，虽然工作很忙，当地也没有中国饭店，但仍要设法让大家过好在黑非洲的第一个春节。我打听到了在郊区有一家小的越南饭店，就开车去看了一下。原来是三间小茅屋，主人是参加法国外籍军团去越南打过仗的几内亚军官，娶了一个越南媳妇，回国后就在这个茅屋里开了个小饭店。媳妇掌勺，他当跑堂，对外说是越南饭店又是中国饭店。主人说他有火锅，可以给我们做涮羊肉。到了除夕晚上，我们全部人马带了好几瓶法国葡萄酒赶到了这家小饭店欢度佳节。吃了几道越南菜后，主人就端上了一只用木炭烧的大火锅。茅屋很小，窗子又少，而且几内亚晚上暴风雨之前气候非常闷热，店堂里的温度可想而知。人人都是汗流浹背，很多同志干脆脱下了衬衣，穿着汗背心吃饭，有的还开玩笑说，如果没有女同志，真的想要赤膊上阵了。过了一会，暴风雨来临了，雷声在空中滚滚而过，大雨在茅屋上倾泻下来，门外窗外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屋子里凉快了不少。我们已酒足饭饱，就坐着聊天等暴风雨过去。非洲暴风雨来得快走得也快，一个多小时后就过去了。大家上车时，听到有人在说，北京已经是春节来到了。

南美洲春节匆匆溜过

我在南美的厄瓜多尔度过了1962年的春节，与其说是度过，还不如说匆匆从我身边溜过去了。1961年底我从非洲回到北京后，总社要我立即参加由老前辈梅益同志率领的新闻代表团访问拉丁美洲。代表团要参加1962年1月1日在哈瓦那举行的古巴解放三周年纪念大会，并且进行一周的访问，然后再去智利和巴西。我国记者协会鉴于当时拉美各国除了古巴以外同我国都没有外交关系，平常来往也不多，所以要我们多去几个国家。我们离北京前听到厄瓜多尔发生了军事政变，比较开明的阿罗塞门纳就任了总统，就用代表团名义发了一个电报给他，希望得到签证前去访问。我们刚刚到了哈瓦那，厄瓜多尔使馆就电话告知总统欢迎我们访问，要我们去办理签证。我们结束在古巴的访问后，在1月下旬乘飞机经过巴拿马到了厄瓜多尔最大的海港瓜亚基尔。我们到后很谨慎，也有些紧张。因为就在几个月前，我国青年代表团应邀前去访问，在机场就被警察扣留送进了监狱，经我代表团一再交涉，邀请单位也提出严重抗议并且要发动群众游行，警察第二天才把代表团放出来并驱逐出境。我们拜访了一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并且参观了市容和一些旅游景点。我们在瓜亚基尔住了三天，没有发生什么事，就在新华社当地的报导员罗曼的陪同下乘飞机去东北安第斯山高原上的首都基多，快到目的地时看到了安第斯山的一座活火山在夜空中一片火光冲天的壮观场面，令人惊叹不已。

我们在基多的宾馆吃过晚饭后，正在梅益同志的房间里商量这里的安排和拜会阿罗塞门纳总统的事，忽然有一个中年的男子敲门进来，从口袋里拿出他的证件，说他是警察局的便衣警察，要检查我们的护照。我们说我们是应总统邀请前来访问的，而且有厄瓜多尔驻哈瓦那使馆发给的有效签证，在瓜亚基尔机场上已检验过了；如果他还有什么疑问，可直接同总统府联系。他不听，一

定要看我们每个人的护照。他拿了我们的护照后，说要到外面的电话间去请示警察局的领导。我们怕他把护照拿走了不还，我和另外一个同志也跟了他到电话间去。他打了好几个电话，最后说他的领导同意还给我们护照，连抱歉一声也没有说就走了。当然，我们也很难弄清这件事是警察局有意制造的还是个别人的胡作非为，罗曼劝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但我们相约在基多的三天里要提高警惕，不给这些便衣警察任何借口。第二天，总统秘书忽然来电话通知总统不是在首都基多而改在瓜亚基尔接见我们，也没有说明原因。当时在首都又盛传要发生军事政变，看来总统受到的压力很大，他能否接见更使我们的访问蒙上了阴影。我们第三天傍晚乘飞机回到了瓜亚基尔，令人高兴的是，总统按预定时间友好地接见了我们，对我们的来访表示欢迎，希望加强两国之间的接触和往来。总统本来是个很健谈的人，但我们可以看出他这次谈话非常小心谨慎，不想谈实质性的问题。我们很理解他的处境，这次接见也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们本来准备好的一些问题也没有提，一个多小时后就告辞出来。当天晚上我们就乘飞机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上了飞机坐定之后，我们中有一个人说，啊哟，春节过去了。我们才想起了前几天是春节。这些天来大家工作和思想都有些紧张，把春节忘得一干二净了。

三个“冒牌教授”西德过春节

1969年11月，新华社领导通知我在年底之前赶到西德首都波恩去，接替项前同志担任常驻记者，因为他在那里检查身体发现患了癌症，要很快回国来开刀。几个月前，周总理要求新华社尽快恢复从“文革”开始以来记者都已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几乎完全停止的国外分社。我知道领导上要派我再去国外工作，但没有想到要去西德。当时两国还没有建交，我不懂德文，也不熟悉德国问题，困难是会很多的。我马上做各方面的准备，经过巴黎办好签证赶

到波恩时，已是1969年最后一天的中午了。我到了之后，发现困难比我预料的还大得多。很快，项前同志夫妇就回国了。分社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翻译和一个厨师，他们都是年轻人，比我早一个多月轮换来的。翻译同志只在新华社的外语培训班学了两年德文，“文革”时又荒疏了三年，连看德文报纸也有困难。“文革”以后，驻外人员的夫人都是不让一起出国的，所以只有我们三个男的住在一幢楼房里。德国邻居们看到每天早晚都有送报刊的人把一大捆报刊送到我们门口来，就说那里住了三个“红色中国的教授”。

不久，就到春节了。我过去常在国外过春节，他们两个都还是第一次。我们本来是在厨房里吃饭的，除夕那天晚上，改在了请客的大餐厅里，并且摆上了请客的一套餐具。厨师先做了四个凉菜，我们吃了一会，干了几杯葡萄酒；然后休息一会，厨师再去做四个热菜，再干了几杯；吃了一阵再休息一会，他最后端上了一只涮羊肉的大电锅。这是我们第一次用这样的形式过春节，我举起了酒杯对他们说，我们都是新到这里，工作中困难很大，大家也不要气馁，我们团结一起克服困难，把工作做好。他们两个也很激动，说他们一定要努力，不辜负国内对我们的期望。快到半夜时，忽然来了电话，原来是一个邻居打来的，他用不太道地的中文对我说，“祝你们三个教授春节快乐。”他是克虏伯钢铁公司销售部负责亚洲贸易的高级职员，在西柏林大学学过几年汉语，他曾来拜访过我们几次，他说他要儿子马上给我们送来一件春节礼物。送到后我们打开礼品盒，原来是他夫人亲自做的一个巧克力大蛋糕。我们也回赠了他儿子四个大肉包子，他很高兴地回去了。这次春节的情景令人难忘，两年多后我国同联邦德国建交，我们分社受到了表扬，我也调到了外交部工作。

没有膻味的新西兰涮羊肉

1986年初，我从奥地利离任回国，由于已年过花甲，就退出了外交的第

一线。我在维也纳工作了近六年，除了担任驻奥地利的大使外，还兼任我国驻联合国维也纳组织的大使，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近些年来显得越来越重要的机构是在1957年成立的，任务一是开展和平利用原子能，二是防止核扩散。第三世界希望大国帮助他们和平利用原子能，而美国的主要兴趣是在防止核扩散，保持核垄断的地位，因此内部争吵很多。我国是在1984年6月参加该机构的，我担任了首任驻该机构的代表。回国后，部内要我担任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从而开始了学者的生活。我在多年担任驻外记者和驻外大使时，曾到过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等四大洲，没有去过大洋洲。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同北美、西欧和苏欧的关系，我想今后到大洋洲的机会可能很少甚至没有了。

不料，我到研究所以后不久，我国参加了亚洲太平洋合作会议。这是一个由学者、工商业者和研究人员三方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参加的有本地区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台湾是作为地区参加的。参加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合作委员会，一般都设在本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里，因此我国的合作委员会也设在我主持的研究所。会长是曾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外交家、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员宦乡同志，副会长有多位各界代表人士，我也是其中之一。合作会议每次大会结束时选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下届轮值国，在大约一年半的大会期间召开两、三次理事会，另外还有几个专门委员会。

过了两年多，正好由新西兰担任轮值国，因此我有机会去了三次新西兰参加会议，当时去新西兰一般都经过澳大利亚或日本，所以我也去过两次澳大利亚。理事会开会一般两、三天，台湾的代表是辜振甫老先生，他的夫人是我国早期的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先生的孙女。辜振甫先生是著名的工商业家和学者，我在担任副会长期间，同他每年一起开会两、三次。他是一位很和蔼和很有礼貌的老先生，后来他被推选为台湾海基会的会长，合作会议开会的事就由他的侄子辜廉松代替了。他作为海基会会长同我方的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新加